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作家 传记文学研究

刘曙雄 赵白生 魏丽明等 著

文学
论
丛



YZL1089017390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

刘曙雄 赵白生 魏丽明等 著



YZLI089017390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刘曙雄,赵白生,魏丽明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1394-0

I. ①东… II. ①刘…②赵…③魏… III. ①传记文学—文学研究—东方国家
IV. ①I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0692 号

书 名: 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刘曙雄 赵白生 魏丽明等 著

责任编辑: 刘 虹 张 冰

封面图片: 王小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394-0/I·25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liuhong9999@hotmail.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512 千字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项目批准号:05JJD750.47—99161

目 录

绪 论	1
-----------	---

作家篇

引 言	9
自传中的假面	
——略论三岛由纪夫传记文学	12
韩国现代作家自传文学论略	
——以《韩国现代作家三十三人自传》为中心	16
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	
——以传记文学为视角	25
越南近现代写自传的第一人	
——潘佩珠及其《潘佩珠年表》初探	31
寻找诗人的真实:在事实与真理之间	
——泰戈尔传记研究	40
介南德尔·古马尔小说中的“自我镜像”	
——以《十束光》为个案的分析	48
“西奈山的火光”的双重内涵	
——伊克巴尔的希望与视野	57
传之传承	
——赫达亚特及其传记文学研究	65
传记文学与国家历史的融合	
——以苏阿德·萨巴赫的《海湾之鹰》为例	74
三本他传与“纪伯伦形象”	
——从“神秘化”到“人性化”	81
寻找理性的苏非——思·知·诗意	
——兼论努埃曼的自传《七十述怀》	88
“一切作品皆自传”	
——非洲作家自传个案研究	97
抵制欧洲中心主义的流散者	
——论库切文化身份的归属	103
“风景之发现”观照下的《自传的回声》	
——评马哈福兹传记创作艺术	111

女性反抗者的精神成长史	
——评埃及女作家赛阿达薇的传记创作	120
挣扎背后的挑战:非洲女作家与西方女权运动	
——以艾默契塔的《昂首水上》为个案	129
作品篇	
引 言	137
“广岛”如何改变大江	
——论《广岛札记》之于大江文学的意义	140
宫泽贤治的法华信仰	
——佐藤隆房的《宫泽贤治》	145
动荡时代下的迷惘人生	
——“内向的一代”的自传性作品解读	151
心理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	
——姜珍浩《韩国文坛逸史》题解	158
传记文学在蒙古文学史中的重要性	
——以《蒙古文学概要》为例	161
传记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史学性和文学性	
——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解析	165
中国学者的主体眼光	
——《普列姆昌德评传》论析	176
平凡之处不平凡	
——论纳拉扬的自传《我的日子》	183
从无名到知名	
——论《无名印度人自传》之出版	189
传记文学对电影艺术的启迪	
——论雷伊“阿普三部曲”的创作动机	197
真实和朴素是传记文学的本源	
——读阿扎德的《生命之水》	205
在书写中为自己与一座城市立传	
——帕慕克作品中的传记色彩	213
纪伯伦传记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研究者的启示	
——兼议“学术型传记”的理论与实践	224
库切的自传观和自传写作	
——以《男孩》、《青春》两部自传为例	232
现代希伯来文学传记传统与阿摩司·奥兹	
——兼评《爱与黑暗的故事》	241

精神的试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	
——《阿凯：童年岁月》的自传价值	251
女性自传中自我主体的漂移性	
——以赛阿达薇的自传《我的人生书简》为例	260
南非黑人艰难的社会化历程	
——透视姆赫雷雷的自传《沿着第二大道》	267
成长主题与跨文化身份建构	
——解读卡马拉·莱依自传体小说《黑孩子》	273

文献篇

引 言	285
《大江健三郎传说》节选	287
《〈朝光〉·〈三千里〉时代》	299
《潘佩珠年表》节选	310
《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小传》	322
《驼队的铃声》序言	336
《海湾之鹰：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节选	345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序	359
《双角：随笔和访谈》节选	367
参考文献	372
项目组成员、撰稿人及撰写篇名	378

绪 论

传记文学是一个在东西方文学中均有着悠久历史的文类,也是现当代文学中最受关注的文类之一。我国最早的传记文学代表作可以追溯到《史记》,希伯来《旧约》中的“摩西五经”可算是希伯来传记文学的雏形,而“历史书”中的《撒母耳记》、《列王记》篇章则可以称得上是成熟的传记文学作品^①。由于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教育功能、社会效用,传记文学在世界文坛逐渐成为主流文类。针对传记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强劲的发展势头,英国皇家文学会主席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甚至称传记文学为文学世界里的“超级大国”。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学术界在最近三十年里非常重视对传记文学的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一批重要的理论家,如萨义德、保罗·德曼、奥尔尼、勒热讷、艾津等都对传记文学有所论述,后三位学者甚至终生研究传记文学。相对而言,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对东方传记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这一课题虽然有学者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性工作,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没有展开,缺乏在理论指导下所从事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而东方传记文学和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据统计,东方作家传记在东方文学学科的起步阶段只有郑振铎未完稿的《太戈尔传》;在东方文学学科的发展阶段,仅有《世界文学》杂志登载了一系列东方作家的小传;在东方文学学科的繁荣阶段,一些东方经典作家的传记文学作品才陆续问世,如泰戈尔的传记作品在中国已出版了至少二十二种,川端康成的传记有近十种,三岛由纪夫的传记3种,普列姆昌德的传记3种,纪伯伦的传记2种,此外夏目漱石、马哈福兹等作家的传记也已经出版。但总体而言,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近些年国内对外国传记文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主要表现在对西方传记文学的研究上。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研究有待深入,东方传记文学的研究更需要系统的有东方特色的传记文学理论指导。在大量翻译、介绍和评述东方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同时,如果能较全面地梳理东方作家传记文学史纲,进一步归纳和提升东方传记文学理论,无疑将有助于东方文学学科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传记文学的分类可依据作者的不同、传主身份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划分。“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指对近现代东方文学领域各主要语种的杰出作家的传记文学研究,这些传记文学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作家本人撰写的传记、自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传记文学作品;二是传记作家、学者、记者等为这些作家所作的文学传记、所发表的具有文学意义的评传等。其中第二部分既包括东方作者所创作的作品,也包括

^① 杨正润主编:《外国传记鉴赏辞典·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欧美作者书写东方作家的作品。而本课题中“东方”一词的概念,则不但指一般地理意义上的东方,同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东方,它涵盖了亚洲与非洲。因而,本课题所研究的对象覆盖面十分之广,其中一部分作家,出生于东方,但又在西方生活过比较长的时间,或者一直旅居欧美。地域所能表示的,往往只是这一部分作家的出生地或者国籍,但他们的文化身份却又比较复杂,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地域所能涵盖的范围,不能以国家或者地区来进行简单的划分。综合考虑这种种因素,并结合在研究实践中所得到的成果,本课题的最终成果在整体上放弃了最初所设想的、也是在一般东方研究最为常见的按地域划分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作家篇、作品篇和文献篇的三分法,并在各个分类中,再兼而考虑按地域之分进行编排。作家篇的内容包括围绕传记文学的主题,梳理以东方作家为传主的文献和作品,对作家本人及其文学创作进行研究。作品篇是对东方各主要语种中传记文学作品本身所展开的研究。属于传记文学的作品类别繁多,本项目选择的主要是与东方重要作家的创作和人生经历关系紧密的文类,如包括自传、他传和评传在内的传记、自传性文学作品和书写某一语种作家群体的作品。文献篇力求体现东方作家传记文学作品的基本类别,节选叙事性强的自传和他传、回忆录、小传和作品序言,从原文翻译为中文并作述评。这样的布局,一方面力图从一种文学的、文化的角度,从整体上对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把握,希望使读者更直观地获得关于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学理上的、宏观上的认识,另一面又最大限度地兼顾地域的同时,避免了地域划分所造成的刻板 and 机械,对一些有着多重文化身份,如纪伯伦、库切等这样的作家进行了合乎实际的安置。

本课题所涉及的作家有三十多位,每一位都是所属语种、民族、文化的代表性作家。其中既包括在近现代世界文学史上曾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启了近代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之门的泰戈尔、纪伯伦,又包括对本民族文学、文化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如伊克巴尔、普列姆昌德、纳拉扬、黎萨尔等。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对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泰戈尔、帕慕克、阿摩司·奥兹、马哈福兹、沃莱·索因卡、库切这些在国际上已经获得了肯定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家的研究,也有对朝鲜和韩国当代作家群、对非洲当代作家以及传记文学作品、对阿拉伯语和非洲当代代表性女作家及其代表性传记文学作品的关注和解读。由于语言的关系,同时更由于文化力量强弱对比的关系,东方文学与欧美文学相比,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我国,对当代东方文学关注的热点大部分都集中在日本文学上。对于东方其他国家当代文学的现状,我国学界还了解得很不充分。本课题对于整个东方地区和民族作家传记文学的研究,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这种尝试已经为我们带来了姆赫雷雷,带来了赛阿达薇,带来了艾默契塔,我们相信在以后的传记文学学术研究中,多语种、多民族的当代东方作家群体在我国世界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本课题涉及的地域广阔,语种繁多,文体丰富,这使本课题一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创新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相当的难度。结合研究中的实际来看,本课题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原始资料的收集困难。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必须以具体的文本为基础,对于“东方作家传记文学”这一课题来说,尽管在研究中课题组成员已

经尽力进行了资料的收集,但由于语种过于繁多,国内相关语种研究人员的缺乏,本课题不得不放弃了一部分语种,如非洲的豪萨语、斯瓦希里语作家的传记文学。第二,国内已有研究的缺乏。尽管传记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对传记文学的研究,尤其是东方传记文学的研究在我国并未充分展开。本课题的研究是国内对于这一领域的第一次系统探索和研究。第三,相关文学理论的薄弱。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于传记文学的研究渐成显学,但目前为止,国际国内学界对东方传记文学以及这一领域内的东方作家传记文学学理上的思考与建设还显欠缺。因此,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可供借鉴与提供指导,可以说是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保证课题研究的质量,本课题组组成了一个阵容比较齐全的研究团队,课题组成员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研究人员均长期从事相关语种的教学、研究,绝大部分都有过境外求学和研究经历,这不但保证了本课题在研究中所采用的资料是真实可靠的,也保证了本课题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尊重相关语种、民族、地区文学文化的历史和内涵的基础上展开的。为了学习和吸取国际国内当代传记研究的最新成果,本课题依托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邀请国际上的传记文学研究专家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举办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参与组织召开以“读图时代的传记文学”为题和以“传记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为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课题组成员分享研究心得,交流学术思想,探讨研究方法,在可供借鉴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较为缺乏的前提下,课题组成员“摸着石头过河”,共同探索适用于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并最终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

作为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之一,传记文学的真实性是它与其他文学种类最大的区别。传记文学作品承载历史,再现历史。世界近现代史上,除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均遭受过殖民或半殖民统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东方作家的身份一般不仅是作家,同时也是反对殖民统治的文化斗士,有部分东方作家甚至是参与实际政治斗争的先锋人物。这样的历史经历和记忆在近现代东方作家传记文学中留下了十分清晰的痕迹。因此,从整体来看,近现代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价值取向,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大部分近现代(由于东方不同国家取得独立的时间跨度很大,因此也包括部分当代)东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国家的历史与个人的传记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东方近现代文学史上,争取民族独立与反抗殖民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东方近现代作家传记文学是主要的篇章。在越南以潘佩珠为传主的传记作品、在菲律宾以何塞·黎萨尔为传主的传记作品、在科威特以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为传主的传记作品都是其中的典型。在其他传记文学作品,如以泰戈尔为传主、以伊克巴尔为传主、以朝鲜或韩国近现代作家为传主的作品中,也都有关于传主与殖民当局的进行斗争的描述和赞颂。

进入当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殖民统治者的军事撤退,反殖民斗争的主题在一些东方作家传记文学作品中的痕迹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对殖民文化影响的

反思,是试图在后殖民文化氛围下,对自身民族身份进行确认和定位的努力。这一转变在遭受统治时间较长、殖民文化影响深刻的民族和地域的传记文学作品中较为明显。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J. M. 库切的自传作品,尼日利亚著名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沃莱·索因卡的自传作品,以阿摩司·奥兹的自传体小说和自传性作品为代表的大部分现代希伯来传记文学等,都体现了这种文化上的挣扎与斗争。实际上,这种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与对自身定位的寻找,对于大部分与作家生活环境类似的本民族、本地域的人来说是普遍存在的。而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心灵更为敏感,内在的思想、情感反应更为激烈,感受的表达更为清晰、有力。他们的传记文学作品,是在代表那些被损害的、被牺牲的、被忽视的弱势文化和群体发出声音,争取一席之地。因此,作家的传记文学,尤其是自传作品往往可以看作是该民族、该地域人民的心灵史。

日本在东方近现代史上的发展轨迹与东方其他国家均不相同。在日本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中反对殖民斗争的主题是罕见的,取而代之的是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的价值的探索。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的系列自传作品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从这一角度而言,日本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与欧美作家传记更为相似。

性别意识是近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个新主题,在东方作家传记文学作品中这类作品也陆续涌现,其中又以自传为主。如阿拉伯语女作家赛阿达薇的自传作品和非洲黑人女作家的自传作品。但与欧美女作家的女性自传不同的是,在东方女作家的自传作品中,女性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和与男性的斗争并不是单一的,它们往往和弱势民族文化与欧美文化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个人经验与民族经历混杂纠缠,作品的主题一般而言涵盖了女性意识、阶级意识、种族意识等诸多方面。这种情况也再一次说明,从整体上看,东方作家传记文学除了是作家个人的生命故事之外,也是作家所代表的民族与本民族文化的政治和文化隐喻。本课题中的相关研究成果揭示了无论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过程中,还是在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氛围下,东方女性的觉醒和争取自身权利的要求并不仅仅代表一个性别群体,而是反映了东方民族的整体要求。

与欧美文学文化相比,东方文学文化的构成体系显得更为复杂,地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更为突出。东亚东北亚的汉文化、南亚东南亚的印度教文化、南亚的穆斯林文化、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希伯来文化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强大的生命力,这使得东方文学文化往往在共同的基本特征之外又呈现出各异的特性。在东方作家传记文学这一分类中,这种地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不同特征也比较明显。

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主的汉文化中,有着十分发达的史传文化传统,史传文学不但是文学作品,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在这种史传文化影响下,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作家传记文学呈现出一种两难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作家传记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一种必然,另一方面又因为自传体作品往往被认为是真实的记录而使得作家在创作类似作品时如履薄冰。传记文学是蒙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蒙古文

学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蒙古的传记文学史,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之林可以说也属少见。作为同样拥有悠久的传记文学历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其传记传统则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波斯语文学史上的宗教人物传记,主要是苏非文学中的各长老传、书信集,如贾米的《长老传》和莫拉维的《书信集》,以及由此形成的波斯语苏非传记文学传统和流传下来的苏非思想,是波斯语现代传记文学的重新崛起和发展的基础。阿拉伯自传从9世纪开始发展到15世纪末,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觉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篇方式、话语表达方式、自我精神觉醒模式等传统,为20世纪初阿拉伯“新传记”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学根基。但宗教传统与作家传记文学的繁荣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南亚地区,有着丰富的神话与宗教传说,但传记文学这一类型却并不发达,这与南亚地区的传统文学主要以“神”为主题有关。因此,直到近现代,在南亚次大陆地区才陆续出现了以乌尔都语、印地语、英语等语言书写的传记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作家传记文学。南亚次大陆传记文学的兴起,与南亚文学的现代化转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文学的关注对象从“神”逐渐转变为“人”的过程中,传记文学才得到了发展的机会。文类的缺失,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对于进行东方传记文学研究来说,南亚传统文学中传记文学的薄弱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文学文化问题。

整体来看,东方现代传记文学在历史的传承之下,在作品创作方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但传记文学在东方的研究现状,与其他文学种类,如诗歌、小说、戏剧等相比,却是薄弱的;与近年来欧美的传记文学研究相比,也是比较滞后的。对东方传记文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但是东方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必然,也是国际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和东西方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必需。本课题“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所涉及的语种之多样,所使用的第一手资料之丰富,都是之前的研究所从未有过的。对于丰富多样的作品,本课题既注重其共同点,又充分重视各语种或地域文学的不同。因此,综合起来看,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我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传记文学研究领域,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决定了以“人”为描写和再现对象的传记文学天然地具有复杂性和跨学科性。对传记文学进行研究,应当多学科并进。跨学科的共时性研究,是了解、再现和全面评价传主以及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的最佳途径。在欧美传记文学研究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正在兴起。传统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精神分析法、新历史主义、社会学理论、生态环境学、疾病学、基因理论等,被广泛地应用于传记文学的研究之中。对东方传记文学来说,同样也应该积极地进行这种尝试。而本课题“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的研究实践也证明,由于近现代东方作家传记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斗争、文化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对相关作品进行解读和研究时,综合运用新历史主义、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是十分贴切且有益的。这种研究有助于对传主和历史形成立体的、全面的认识。同时,跨文化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使东方的读者和研究者看到西方是如何看待东方,以促使东方思考在后殖民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东方传记文学乃至东方文学应该如何定位和自处。

东方作家传记文学在较为强烈的政治性之外,其文学方面的特点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东方文学悠久的历史为现代东方传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文学资源。在创作手法上,不少东方现代文学作品都吸收和发扬了本民族传统文学的独特之处。如上面提到的阿拉伯现代“新传记”对传统阿拉伯传记手法的继承;又如,第一位创作自传的印度现代作家纳拉扬,在叙述手法上对印度史诗故事框架结构的借鉴和化用;以及当代波斯语传记文学对苏非传记文学的承传等等。作为传主,大部分现代东方作家本身便是本民族传统语言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文学创作对本民族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因此,以他们为传主的传记文学作品,自然也是梳理其民族文学现代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研究资料。深化对东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作家传记文学的认识,也就能加深对该民族、该地区文学发展的认识,这能进一步保证我们对东方文学的发展轨迹既有个别的、具体的了解,又有整体的、宏观的把握。

本课题除了对东方作家传记文学进行研究,也对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一部分经典文献进行了翻译与评述。东方文学这一概念涉及的地域十分广阔,其包括的语种文学也极为纷繁,尤其其中大部分为非通用语种文学,也就是俗称的“小语种”文学。仅以印度为例,宪法规定的联邦官方语言就有 18 种之多。事实上,所谓的“小语种”并不小,但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弱势,这些非通用语及其文学所获得的关注十分有限。而这些语种文献资料的缺乏,也是造成当下东方文学研究对象具有较大局限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课题文献篇所附的传记文学作品原典,均是来自第一手资料。其涉及的语种,在英语之外,包括了日语、韩(朝)语、越南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文献篇中所涉及的作家,均是各语种、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这不但为读者和学界提供了关于东方作家传记文学更多、更新、更直接的材料,而且也为学界了解东方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文学的批评与文学的创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东方传记文学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其现代化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与东方文学各个文类一样,同样会遇到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对欧美文学、文论的借鉴,已经并将继续在一定程度上为东方文学在现当代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并促使现代东方文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步成熟。对东方作家传记文学而言也同样如此。大部分近现代东方作家传记文学,或承载着本民族的政治希望,或再现本民族文化与欧美殖民文化抗争,也有些宣扬本民族的骄傲。同时,一部分东方作家传记文学作品也存在不够严谨的问题,或者说缺乏一种宏观的历史眼光。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为如何看待东方传记文学提供一个更为学术的视角,从而促进当代东方作家传记文学创作的发展。

本课题另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在既有学术研究薄弱的条件下,在西方对于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缺乏应有重视的现状下,我国学者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披沙拣金,迈出了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研究的第一步,这代表了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与侵袭时东方学者的回应。这也强有力地表明,在世界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中,中国学者、东方学者完全可以站在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 家 篇

引言

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是目前世界文学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划分方式,但由于经济、军事力量强弱对比的差异,近现代以来东方文学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曾将人类文化分成四大体系,分别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其中前三者都属于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历史上,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东方学者和东方民族来说,只有先了解自己,才能更了解别人,才能逐渐变得有力,与西方走向平等与对话。

要了解东方文化,东方文学是一个重要途径;而东方作家,尤其是东方著名作家,作为东方文学的创造者,无疑是东方文学这片天空里最为耀眼的星星。《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的作家篇中,选取了东方各民族现当代的著名作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传记的研究,通过对他们的创作、思想、生平的分析,来开辟东方传记文学这片未开垦的学术处女地,来探索东方文学星空图的更深奥秘。

本篇所涉及的作家,在地域上覆盖了东至东亚东北亚的日本、韩国,西至西亚中东的伊朗、黎巴嫩,同时还包括了北非、西非、南非的多位著名作家。为了研读的方便,同时也为了读者能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概念,本篇大体上以研究对象在地域上从东向西的顺序编排各研究文章。本篇共有文章 16 篇,探讨了 15 位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均是近现代以来本民族或本地区文学的代表,他们分别是:日本著名作家、富有争议性的三岛由纪夫,韩国当代作家黄皙暎、文淳太等 33 人,菲律宾著名民族诗人何塞·黎萨尔,越南自传文学第一人潘佩珠,印度著名作家、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心理小说大家介南德尔·古马尔,巴基斯坦建国的精神之父伊克巴尔,伊朗当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赫达亚特,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黎巴嫩著名诗人、“叙美派”的开创者和中坚人物纪伯伦,黎巴嫩“海外三杰”之一、与纪伯伦文名不相伯仲的米哈依勒·努埃曼,南非著名作家、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埃及著名作家、198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以及两位在世界文坛备受瞩目的当代东方女作家:当代阿拉伯世界最受争议的女作家埃及的纳娃勒·赛阿达薇,为处于贫困和被压迫地位的第三世界妇女代言的尼日利亚著名女作家布琦·艾默契塔。

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质。但“真实”对于文学家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生活细节的忠实记录。作家对事物的想象与虚构是作家创作的主要手段,因此,在作家传记文学中——无论是关于作家的传记文学,还是作家自己创作的自传或他传——“真实性”的含义比其他传记文学更为丰富、多义、值得探讨。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曾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现当代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日本作家之一,被誉为“日本的海明威”。他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主题对性、死亡的关注,也由于他极端的政治取向和自杀方式,而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三岛由纪夫有一部小说名为《假

面的告白》，文学创作就是他借着文字的面具掩藏着的自我剖白，三岛曾说过，当他人认为在他的自述中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其实所看到的不过是他的演技（有趣的是，三岛由纪夫的确还是一名演员和导演）。因此，对他的自传文字进行分辨和剖析，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拨开迷雾，了解他潜藏着的真实，从而理性地看待他的文学作品和其中蕴含的思想。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作家强调文学的真实，其中有一批作家特别强调关注个人的真实。但这种真实究竟是什么呢？作家李清俊认为“文学是作家通过语言及其秩序所表达的对生活的热爱”，金承钰对真实的看法是“讲述人和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事情，从中发现真实，恰如其分地把生活的真实展示给人，这就是小说家的大任务。”可见，韩国作家强调关注个人的真实，但这里的个人并不是脱离群体的个人，这和西方文学所倡导的张扬个性是完全不同的。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罗宾德拉纳·泰戈尔成为了许多传记的传主。但他自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传记都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诗人泰戈尔。他认为，诗人的真实是内在的真实，与生活事件的一一如实记录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一本拥有丰富资料的传记必然不是一本真正的“诗人的传记”，泰戈尔在他的一生中经常重复这一关于诗人的传记的观点。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观点与泰戈尔相似，他在《自传的回声》中的写作呈现给读者的就像是“现实生活和梦幻世界交织而成”的一个个“断片”，具有自传性质的短章与断想、寓言，对孩提时代的回忆、梦幻，苏非式的格言与隽语在书中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他所说的真实。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著名作家库切的观点却与以上两位的看法相映成趣，因为库切说“一切作品皆自传”。“钱钟书说，‘自传就是别传’；库切却说，别传自传如影随形”。真实究竟如何？自传与别传在库切那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探讨。对他人心理的分析往往可以折射出分析者自我的真实想法，印度作家介南德尔·古马尔的小说中就充满了这样的“自我镜像”。在西方的眼中，东方充满了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尤其在早期更是如此。前往东方的旅行，是探访神秘之旅；来自东方的诗人和文学家，都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早期泰戈尔和纪伯伦在西方的形象都是如此。作为一位在西方生活了许多年并最终逝世于美国的东方诗人，纪伯伦在西方传记作家笔下的形象经历了从神秘的人走向人性的人的过程，真实的纪伯伦形象也因此逐渐显现。与纪伯伦形象的多变相比，黎巴嫩另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米哈依勒·努埃曼在自传《七十述怀》中对自我的成长进行了清晰的追述，作家追随着苏非主义的精神指引，抗拒生活的浮沫、追寻纯真。

文学来源于生活，传记文学尤其如此。东方近现代作家传记文学作品，在整体上反应了作家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经历。东方自近代以来遭受了殖民统治的苦难，经历了追求自由、独立的斗争，至今仍在为平等、自立而呼喊，在内容和主题上与民族、国家的紧密联系也成为了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另一大特点。朝鲜、韩国自古受汉文化影响颇深，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和多灾多难的近现代历史赋予了韩国文学重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品格。黄皙暎、赵海一、文淳太等作家在自传叙述中都认为，作家的社会使命、文学的社会使命大于文学的艺术追求。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越南，同样在文化上也与中国关系密切。作为越南近代传记文学第一人，潘佩珠自幼受汉文化熏